

24.55

毕节文史资料 选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编
贵州省毕节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

H217/05

毕节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辑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
贵州省毕节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

一九八四年六月

4521705



邓止戈同志和在毕节的部分老红军合影。

左起：路占全、熊金祥、尹焕臣、邓止戈、
周素芬、林作清、汪 宏

彭裕硕 摄影



七星关公路桥

彭裕硕 摄影

目 录

邓止戈同志谈两进毕节的战斗历程	李声亮 整理	(1)
地下尖兵 ——忆卢育生烈士	尹同农口述 马文骏整理	(12)
回顾“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”的活动	林绍铭	(28)
毕节地下党活动概况	宁起枷	(37)
他们播下了革命火种 ——回忆林青同志在镇雄的活动	王余芳 口述 王有策 笔录	(43)
清末贵州的一位爱国彝族诗人	钟 靡	(47)
题叙二则	余若瑔	(49)
黄齐生一九三八年毕节之行	刘世桢	(58)
早期的毕节电影事业	周悟真	(61)

漫话毕节武林	罗 明口述 罗永华整理	(67)
国民党工兵部队的浅介	李成志	(69)
毕节文史古迹：七星关、七星关桥、层台山	胡玉辉等	(78)
毕节历代自然灾害年表	胡玉辉 编	(85)
毕节县地名词目选：海子街简介	魏广略 谭太祥	(90)
邓颖超同志在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		(95)
杨成武同志在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		(104)
质疑·更正		(108)
邓止戈同志在毕节和老红军合影	彭裕硕 摄	(封二)
七星关公路桥	彭裕硕 摄	(封三)

邓止戈同志谈两进毕节的战斗历程

李声亮 整理

编者按：应中共毕节地委和县委的邀请，原任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委员、第二任书记，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，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顾问的邓止戈同志，于一九八三年八月来毕节访问。这份史料是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，并经邓止戈同志复审定稿的。本稿由中共毕节县委党史办公室提供。



邓止戈同志在杨家湾
左为老红军汪宏同志

彭裕硕 摄影

我在有生之年，能够重返阔别四十七年的旧地——毕节，心情十分高兴！我感到人亲、山水亲，毕生难忘。毕节这个地

方对支援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抗日是有贡献的。今天，毕节地、县领导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示，为编写毕节“史志”亲率党史办的同志和我坐在一起回忆毕节的史实，我更感到高兴！

现在，我就你们提出的问题，仅我能够回忆的情况谈一谈。

首先谈一下我是什么时候来毕节的。我来毕节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一九三四年秋天，因当时贵州是中共地下党的创建时期，我和黄大陆同志到贵州负责军事工作。

我俩在贵阳研究军事工作，经过反复考虑之后，黄大陆同志提出，要建立贵州武装，必须搞四边，即从贵州黔东、黔西、黔南、黔北边区开始创建武装力量。而这几个地方，又要以“川滇黔边区”的毕节作为重点。另一方面是犹禹九部队驻在毕节，和我们有关系，能进得去。我即到犹禹九部当参谋。侯之担的林秀生部队，我们不但熟悉情况，而且有人缘能进去，我们就派林崇山同志打进去，先熟悉官兵，后做外围工作，逐步发展我们的人，组建党的武装。黄大陆同志就在黔军二十五军第一师何知重部当参谋长，他利用这个要职，掩护自己的身份，四处扩大关系，找线索，一有可乘之机就派同志打进敌部做工作，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打进“钉子”开展工作。

我到毕节带有一个贵州青年王平作为我的随员。我们一道途经织金，听取在那里开展工作的赵卓成的汇报，另外还会见一位姓刘（名字记不清了）的中学教员，并招待我在他家吃饭。后来由赵卓成找了两个农民护送我离开织金，有一个直接送我到毕节。我到毕节后，首先住在珠市街李代祥家，后来找到了原在毕节搞军事工作的王冠兰、杨一民等几位同志，我们一起研究工作，把王平安排到青年学生中搞青年活动，王

兰和杨一民同志继续作武装工作。杨一民是云南蒙自芷村人，现已去世。王冠兰是云南什么地方人记不起了，一九三六年二月以后就和我没有联系了，他后来是否参加滇东北游击队，我不清楚。

当时毕节县的地方武装，一个是阴底区安岳阶，另一个是邓广乾。这两个人都同时猜得有人在家里造枪，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。王冠兰、杨一民就反复与这些人联系，其中包括席大明、李双戈等人在内。

王平一到毕节就和高家、李家、邱家的青年女娃娃讲恋爱，一天到处去玩，影响不好，后来我就叫他回贵阳去，另外安排他的任务。

一九三四年底，中央红军到达了贵州，我们准备向中央红军联系。但遵义会议以后，犹禹九的部队就被调到威宁、水城一带（包括二十五军的其他部队都调在这一带）。而犹的部队直接驻在水城地方。在安顺我和黄大陆同志见了面，准备进行“兵变”。因当时的二十五军反蒋情绪很高，主要理由是：蒋介石看不起贵州人，改编部队，更换人马，整个二十五军编成两个师。王家烈调到军部作顾问委员，没有实权。其他编余军官很多，不管不问，没有安置，导致官兵对蒋介石非常愤恨。他们总觉得蒋介石搞亲疏内别，拉帮结伙，打击异己。贵州已经“亡省”的说法在人民群众中普遍议论开，一时激起了贵州上、中、下层人士的不满，反蒋情绪更加高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很有利于我们推动二十五军的反蒋活动。当时有一个副官长跟黄大陆同志的关系很好，他把得知的情报先告诉了黄大陆同志，黄大陆同志通过副官长搞清伪旅长周方仁的反蒋方针是什么？而周表示“反蒋反共”建立新黔军，这就和我们分道扬镳了。

一九三五年四月间，秦天真同志到安顺传达了中央特派员

的意见，天真说：“中央特派员指示要我们在川滇黔边搞武装，迎接后来贵州的红军”等等。传达后，天真同志回贵阳，我即回水城继续搞二十五军的工作。

一九三五年八月间，秦天真同志打电报给我，要我到贵阳。我到贵阳和天真同志见面后，天真同志告知林青（李远方）同志被捕的经过，并说刘茂隆已越狱逃出，准备接来同住。第二天茂隆和一个守兵到来。经秦天真介绍，我才第一次见到刘茂隆同志。过了两天，由天真主持开会，会上决定我到川滇黔边区搞武装，天真和茂隆到上海找党中央联系，从此分开了手。

我第二次到毕节是一九三五年八月间，到毕节的主要任务就是遵照中央指示：在川滇黔边开展武装工作，迎接后面来贵州红军的任务。我这次住在大街上高大光家，不久就和地方青年杨杰、邱在先，康庆长等人认识，彼此好感。我向他们宣传进步思想，交谈工作，这些人要求进步的心很迫切。其中接触得比较好的青年有邱在先（后叛变），他是毕节中学的年轻教员，文化较好。另一个是杨杰（后脱党），毕中学生，当时的品学较好，积极靠近我，交待的工作任务一般都能完成。他们学校姓李（李仲群）的校长思想进步，赞同共产党，向我表示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，公开支持学生、教师的爱国行动。我就利用在毕节中学的有利条件开展了抗日宣传等活动，并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，传布共产党的主张，使不少学生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育，从而反对国民党毕节伪政权的黑暗统治。

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考验，我准备在教师、学生、社会青年中发展中坚力量入党。于是就在这年的冬天发展了邱在先、杨杰、康庆长入党。由杨杰负责开始过组织生活，由我单独接头领导，以党支部的名义组织外围群众开办读书会或学习小

组，学习进步书籍，训练积极分子，开展反蒋抗日活动。这个时候“黔北游击队”被消灭了，只剩下川滇黔边区“红军游击队”，我就派康庆长到川、滇、黔边区和“红军游击队”取得联系。当时毕节伪专员莫雄调保安团围剿席大明，在杨家湾一带相持打仗，席大明派人找我出谋，我就对席大明说：“我已派人到川边联系，准备把余泽鸿的部队调来进行掩护（阻击敌人）”。我派去川南的小康带回余泽鸿的信说，他们刚被敌人打败，队伍疲敝，力量不足，加之川军不断围剿，部队分成三路突围、情况十分紧急。我听这个汇报后，我又派小康去建议余泽鸿同志集中兵力突围比分兵突围好。小康经过艰难险阻、长途跋涉，终于找到了余泽鸿同志，更详知了他们部队的情况，刘复初同志只带了几十个人打游击，处于孤军作战的地步。余泽鸿也是这个样子。两军各带几十个人打游击，钳制尾追之敌。以后因他们行踪不定，即未取得联系了。

这个时候，我得知二方面军进入黔地，我就积极做好迎接红军到毕节的工作。当红二方面军进驻黔西时，毕节的绅士们纷纷建议莫雄不要和席大明打了，应招安席大明攻打红军，“一箭双雕”。莫雄就采纳了绅士们的建议，很快派人去跟席大明谈判，并采取封官进爵的办法委任席大明担任黔、大、毕、威、水的“清乡司令”，妄想拉拢席大明和保安团一同在毕节打击红军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席大明来和我商谈，问我怎么办？我对席大明说：第一，红军来了，正是跟他们会师的时候，英雄大有用武之地；第二，你可趁此机会“将计就计”，跟莫雄讲一个条件，要十箱子弹和一定数量的钱，看他怎么行事？席就按照我的意见提出来，莫雄果然答应了，就派人给席大明如数送了子弹和钱。这样，我要席大明部队从毕节沿大方公路进军，抢先占领军事要地，并叮嘱先头部队，千万不能让莫雄的部队占领高地，强占之后，要及时按我指派的人送情报

给红二、六军团。席大明按我的部署办了。当情报送出之后，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了大定（方）。交通员在大定城接上了头，把情报交给六军团参谋长谭家木。谭就转呈贺龙、王震等首长。经过研究，便确定到毕节会师。当红军走到头步桥一带，驻守在头步桥的席大明部队看见红军来了，马上撤下山来欢迎，并跟随进城，另一支部队由席大方率领，这个人打仗勇敢，很有才干。我把他的部队调在城郊占领虎踞山高地，专门对付莫雄的城头部队。当时莫雄站在城楼上观看形势，看见红军来得英勇雄壮，势不可挡。又看到席大方占领虎踞山，知道中了计，就更加胆颤心惊，拔腿就跑。席大方看见敌人跑了，就走下山来就地待令。正当莫雄部队逃之夭夭的时候，红军队伍从城周铺天盖地而来，进驻了毕节城。接着是席大明、周质夫跟随红军进城，全城的人民群众就地欢迎红军。

红军进城之后（关于莫雄何时逃走一事：一、按蒋介石军法“弃城逃跑者杀”，“临阵脱逃者杀”，至于战败退却或转移阵地是允许的，如三天前跑是“弃城逃跑”，头晚上跑是属临阵脱逃，接触敌人后打败转移是莫雄的办法。二、从地理上讲，莫雄逃走必经杨家湾。当时杨家湾一带是席大明割据的地区，席大明在杨家湾时，莫雄如何去得杨家湾？莫雄到杨家湾是在席大明不在杨家湾的时候去的。所以莫雄提前脱逃的说法是不存在的）。我率席大明、周质夫、阮俊臣等人在司令部会见军团首长。接着由两部召开各种会议，接见各阶层进步人士，听取反应汇报。然后采取各种方式宣传发动群众，组织贫苦人民参加革命。在红二、六军团的领导下，把在大定（方）建立的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”迁往毕节。并立即颁发了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》，明确宣布“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

支柱；是川滇黔省广大人民的临时革命政府”，其“战斗任务是：发动、团结、组织全民族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力量，参加抗日反蒋的革命战争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”，以“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”。这些政治主张立即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。形势发展很好。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，军团领导确定立即成立反蒋抗日的各级革命政权。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，首先成立毕节县革命委员会，由苦大仇深的挑水夫朱志清任主席，跟政治部联系做群众工作。这时，人们都惊奇地传开了，说，啊！挑水夫都当县长啦！成为毕节一时的新闻。接着成立抗日救国会，我记得救国会里面有一个肖少斋，年纪较大，经验多，工作积极，红军用的粮食等方面的工作算他出的力最大。另一个是毕节中学教员刘竹均和宁启昆等专门做宣传工作，他把贵阳回来的寒假学生组织起来参加救国会，帮助红军宣传反蒋抗日，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。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引下，为了加强政治上的号召力和地方领导力量，相继组织了人民抗日大同盟、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抗日组织。毕节城里的周素园很有声望，我们就请他出来当抗日救国军司令员。我受党的派遣当参谋长。周素园当司令员的消息一传开，有好多人都说，周素园都投靠共产党了。在社会上的震动很大，于我们建立“乡农会”很有利。农村乡农会的诞生犹如雨后春笋，一下子就建立三十多个，给我们造成了工作上的有利条件。抗日救国军司令部下属成立了三个支队。第一支队长席大明，第二支队长周质夫，第三支队长阮俊臣。那时在大方（大定）也有一个地方武装，他打着抗日救国军的旗号，领导人叫叶方，我们准备和他接头调他来成立第四支队，后来他没有来。

在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，隔两天时间，王震和夏曦同志就问我，是否知道贵阳的最近情况，我说了解的不多，但最近几天从贵阳放寒假回来的有一个学生叫邱照（徐健生），对贵

阳的近况知道一些，是否去找他谈一谈贵阳的情况，王震、夏曦同意了我的意见，我即约邱照同志一道去见王震、夏曦二位首长。会见以后，由夏曦同志和邱照谈话了解贵阳的情况，我因有事要办就走了。至于健生同我活动及谈话的详情可向健生同志。

在党的领导下成立抗日救国军之后，黔、大、毕三县的形势发展很好，令人欢欣鼓舞。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一看到形势很好，认为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具备：一是有地方武装的配合。二是占领了黔、大、毕三个完整的县。同时又活捉了伪专员莫雄的弟弟和伪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。通过审问得到了不少内情，使我们有对付敌人的办法。另外，莫雄逃跑时，除带伪保安团人马走外，其余全部物资留下，对红军的军需供给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加之红军占领的三个完整县都派得有政治部人员下去宣传组织群众，参军参战的人越来越多，三个县的人组建了一个独立团，大约五千人左右，归红五师领导，红军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补充。当时曾决定创建川、滇、黔新苏区。王震同志曾传达建新苏区的决定，提出由救国军司令部组织地方武装担任后勤任务；作战任务由红二方面军主力担任。这样决定之后，我即派席大明去号召收拢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地方武装，统一指挥。因当时黔、大、毕、威、水和川、滇、黔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武装很多，他们反对国民党，保卫自己的家乡，但无法互相联系起来，只要有党的领导，利用席大明等地方人员去收集起来，加以学习整顿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，完全可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，抗日救国。另外派阮俊臣去叙永一带，接余泽鸿来毕会师。那时，余泽鸿的游击队虽然失败了，但由于中央红军留下在这一带的党员骨干较多，其中有的是政治领导骨干，有的是军事领导骨干。所以接这些人到毕节。这样，席大明和阮俊臣各人带着任务走了，只留周质夫

一个支队在毕节附近。

席大明、阮俊臣刚刚走的第二天晚上，中央朱德总司令就发来紧急命令，调二、六军团北上会师。接到中央的命令就即时向有关人员传达，司令部直接向师、团、营、连下达命令，说中央有调令，要部队马上离毕节开拔。那个时候，红军是钢铁纪律，在行动上说走就走，要离开的头一晚上，由政治部主持在城内小校场召开了一个军民大会，贺龙同志在会上讲了话，鼓励大家团结抗日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参加大会的人心情十分振奋，会后还提灯游行，表达了军民之间的团结战斗精神和鱼水难分的情谊。红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分兵两路离开毕节。二军团由威宁街出发，途经茶亭、长春、撒拉溪、杨家湾过七星关到平山堡。六军团从清毕路出发，绕道草堤、十八、朱昌、花厂、田坝、阴底，杨家湾过七星关。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，不愿离开家乡跟红军走，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同志过七星关河去作说服教育工作，不幸在河中溺水牺牲。安葬夏曦之后，部队往西进军到平山堡与二军团会师。一同经野马川、赫章、妈姑，由妈姑北上，经可乐、以则河进入云南奎香地区。在这里回旋和国民党的部队打了不少的仗，后又到镇雄等地休整。所以在这之前，有的人说席大明跑了，这不切合实际，违背了当时的真实情况。

周素园同志参加长征时年满花甲，贺龙同志四十岁，王震同志二十八岁。我们从毕节出发到了赫章乌蒙山区后，打了几个回旋战。取胜赫章进军到云南边境镇雄一带的时候，贺龙同志就喊王震同志去商谈周素园同志是否参加长征的事情，王震同志给我讲，周素园同志那么大年纪了，身体不好，行军有困难。其意思是叫我去跟周素园同志讲，叫他去昆明或香港当寓翁，给党做统战工作，如果他愿意去，我们打土豪得的黄金、银洋多，可以给他二十斤黄金到香港修点房子住下来。我去了

跟周素园同志讲了后，他考虑了一下说：“我今年六十岁了，六十岁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，今天参加了红军，正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时刻，死也要死在红军里。我不愿离开红军。”我将这个情况告诉了王震同志。王震同志又转告贺龙同志，贺龙同志高兴地说：“好！把他抬起来。”就这样，先用八个人抬走，后骑马到延安。毛主席、周副主席都出来欢迎，周素园同志非常高兴，那时，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建立，正在同国民党谈判，中央就任命他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教育部长。后来由于周素园同志身体不好，他那时脚都肿了，要求回南方。后来，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。解放后，中央就任命他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。这是周素园同志参加红军的大体经过。至于毕节还有哪些人参加长征，除了在黔、大、毕参军约三千余群众和我走的时候带我们会师的人员以外，贵阳放假回毕的学生二十多人参加贵州救国军。但是走了一天多后，在七星关碰上打仗产生害怕都跑回来了。只有李代祥、李忠良，还有一个姓詹的等少数人跟着走。后来，李代祥又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转回来了，当时军团部的肖克同志还发给了他路费钱。李忠良在甘南天水的时候离开了部队，后又参加国民党军队，当了炮兵营长，临解放时起义投诚，还有一点功劳，一九五几年死了，秦天真还去参加开追悼会。还有跟周素园一起去时有两个同志，姓名记不起了。

总的说来，毕节、大定（大方）、黔西这三个地方参加的人太多了，对二方面军长征的兵源补充是有极大贡献的。三县组成了两个“独立团”，一个叫十四团，团长肖美成属二军团五师领导。师长贺炳炎，政委谭友林，参谋长高利国，主任肖新春。一个是毕节抗日救国军队编的属六军团十八师领导，叫三十二团，师长张振坤，参谋长刘风，政治部主任李信，团长贺立保，参谋长邓芷戈（其他记不清了）。至于抗日救国军第二支

队周质夫的人员，经过杨家湾整编，原来的一些任职员有的编遣回来了。从红军部队中调来班以上干部领导，划归三十二团。而周质夫本人，因吸“鸦片烟”的瘾大，行军中每天都要吃两次，不适应打仗，怎么行呢？后来干脆动员回原籍。

我任六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，周素园同志就去方面军总部了。一九三八年，我又由中央派回贵州任省工委书记。自从一九三六年二月离开毕节经历了四十七年，今天回毕节可真是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。当年的毕节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，深受压迫和剥削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，现在变了样。

我这次回贵州，当我乘坐的飞机一入贵州境地，我即看见青山绿水，改变了往昔石山兀岩的局面。在贵阳住下后，又到贵定，福泉等地走了一下，才知“贵州山”原是“万宝山”，资源、能源都极丰富，而又是刚刚着手开采的新天地，将来对四化建设必有贡献。

我到大方县时，看见这个过去高寒贫穷的地区，而今在精神面貌、生活水平上和过去比却有天渊之别了！县委刘书记和张书记对我说，他们近年来狠抓生漆、天麻、烤烟等多种经营，生漆是五八年开始抓的，天麻稍晚一点，烤烟每年都抓。大方人民光靠这三样东西就基本改变了穷貌。后来秦天真和徐健生同志告诉我说：“生漆、天麻、烤烟，贵州很普遍”。我说，大方只抓三宝就改变穷貌，如果把贵州这个“万宝山”开发出来，就会振兴中华！振兴贵州！振兴毕节！

最后，祝同志们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，把毕节建设得更好！

邓止戈

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毕节